

王仲尧 著



中國奇僧

王仲尧题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中國奇僧

王仲堯 著

(京)新登字 173 号

中 国 奇 僧

——中国佛教和僧人文化品格研究

王仲尧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46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80049-825-5/G · 306 定价：6.90 元

前 言

(一)

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拥有的社会力量和影响力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驾齐驱。它是一个由理论和思想文化、教徒和僧侣组织、仪式和规则制度三方面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它是一种宗教的信仰实践，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佛教发源于印度，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契机和一些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又在中国发展繁荣，在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同时，也与儒学、道家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

(二)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 (Śakyamuni)。释迦牟尼原名悉达多 (Siddhārtha)，姓乔达摩 (Gautama)。释迦是其族名，牟尼意为明珠，喻为圣人，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其生卒年代，在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中，有种种不同说法，北传佛教一般认为是公元前

565 年至 486 年（参见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51 页），约与中国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同时。

释迦牟尼原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在今尼泊尔南部）王太子，父亲是净饭王（Suddhodana），母亲摩耶夫人（Mahāmāyā）是天臂国（Deradaha）王女。当释迦牟尼出生时，印度正处于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新旧思想交替和宗教非常盛行的时代。

公元前 2000 年到前 1000 年间，原居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向东进入印度恒河流域定居，对原来的土著居民实行压迫剥削，使土著居民绝大多数沦为种族奴隶。公元前 600 年到前 500 年前后，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经济也有所繁荣，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据佛典记载，当时从恒河流域的上游到下游（即中印度一带）就建立起以城市为中心的 16 个大国。释迦牟尼的祖国迦毗罗卫国即是其中的一个较小的贵族政治共和国（释迦牟尼晚年时，该国已为较强大的格萨罗国并吞）。

当时印度各国通行种姓制度。种姓（Varna）原为颜色、肤色之意，雅利安人肤色白，土著居民肤色黑，是两个不同种族，在社会生活中，雅利安种姓占统治地位，土著种姓处于被统治地位，二者都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不准外人干预的社会等级集团，实质上是两大对抗阶级。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又产生阶级分化，雅利安种姓内部又派生出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三个种姓，土著居民则成为第四个种姓，即首陀罗，共形成四个等级。其中第一等级婆罗门，即僧侣，自认为是创造宇宙的“梵天”的代表，社会地位最高贵显要，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是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第二等级是刹帝

利，即武士，包括国王和文武官吏，掌握政治和军事实权，是国家世俗统治者；僧侣和武士两级都是不事生产的贵族奴隶主阶级；第三等级吠舍，即农民、牧人、手工业者、商人等，负缴纳租税和服徭役等义务，多属被剥削者；第四等级首陀罗，即奴隶、杂役、仆人等，社会地位极低。四种姓等级分明，壁垒森严，其社会地位、权利义务、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自成一统，且世代相承。

在释迦牟尼的时代，刹帝利由于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军事实权的增强，对婆罗门把持的特权日益不满，因而支持各种非婆罗门思潮。同时，工商业主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也试图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奴隶们也以各种方式反抗压迫。这些社会现象，对婆罗门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控制都有削弱作用。而在思想领域，则表现为代表各个阶级利益的新思潮层出不穷。释迦牟尼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创立佛教的。

释迦牟尼出生后七天，母亲去世。以后由姨母抚养长大。他天资聪颖，相貌奇伟，从小受婆罗门传统教育，并学习兵法和武功，成为一个学识广博、思想渊博、文武全能、智勇兼备的青年，父亲净饭王对他寄予无穷希望，想要他日后继承王位，做一名“转轮王”（即统一天下的君主）。

但是释迦牟尼喜欢的却是思想，是在精神领域的探索，他更关注那些涉及人生终极意义方面的问题。据佛典载，释迦牟尼驾车出游四门、在东、南、西三门的路上，先后遇到老人、病人和死尸，目睹这些衰老、凄惨形象，又听车夫说，这类无常现象，一切人皆不可免，他因此而感到非常伤心和苦恼。最后他在北门遇到一个沙门（修道者），听老沙门说了出

家解脱生老病死之道，不由肃然起敬，生了出家念头。净饭王坚决反对他出家，为断其念头，在他 16 岁时，即为他娶邻国公主、表妹耶输陀罗为妻，生了一子，即日后佛陀门下著名的十大弟子中号称“密行第一”的罗睺罗。但释迦牟尼 29 岁（一说 19 岁）时，终于毅然抛弃王子地位，离别妻儿，去深山旷野，参访明师，修持学法，开始探求解脱人生痛苦的至道。

出家之后，他曾追随一些宗教大师从事禅定苦修，长达数年之久。他用一切可能的苦行法门来折磨自己的肉体，以求实现精神上的解脱。但是，六年之后，人虽变得形同枯木，却仍然徒劳无获，他觉得自己不仅没有产生觉悟，也未能解开世界之迷。由此他领悟到苦行无益，因为他已经达到了人能够达到的自我克制的极限，却仍未获得解脱之法。于是他决心另寻正道。

改变观念之后，释迦牟尼在附近的荖钵罗树（后称为菩提树）下，铺上吉祥草，东向结跏趺坐，端身正念，发大誓愿，即使血液干涸，身体粉碎，若不证无上大觉，终不起座。据说经过七日七夜（有说 49 天）的冥思苦想，他的内心之中终于出现一个越升越高的精神境界，逐渐超越自身视听的限制，并且破除了时空的障碍，达到心平如境，烦恼全消，疑惑皆澄的世界，把握了终极真理，成就了无上正觉，觉悟到宇宙和人生的真实本质，获得了解脱。这一年他 35 岁。此后，人们就称他为佛，或佛陀，以表彰他是一个真正大彻大悟的智者。后来皈依他的信徒，又称他为“世尊”，意为具足众多功德，能施大利益于世间，于世独尊。

释迦牟尼悟道成佛之后，发誓要在黑暗的世间播响法鼓，

以不朽之音，济渡众生。他开始宣扬自己的学说。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好像来自高山的一道清风，吹到当时笼罩印度社会（尤其是上层）的形而上学空论的陈腐空气之中。佛没有直接攻击种姓制度，但是他在自己的教内也没有承认过它，而且毫无疑问，他的所有活动也削弱了种姓制度，这对于印度社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进步意义。佛要求人们在自己内心之中去寻找真理。据说他曾这样讲过：“不可因为敬畏而接受我所说的法，先要实地试验，如同火炼金一样。”他认为，一切苦难的根源，全在于昧于真理。^①

佛在45年中席不暇暖地到处奔走，足迹遍及恒河两岸。所到之处，一心讲道，教导弟子。他以浅显的语言，生动优美的比喻，向人们阐述人生的苦恼和无常，生死轮回的永无穷尽，分析人生所以充满苦恼的原因，论证涅槃寂静境界的奥妙和欢悦，并指出脱离轮回，超越苦海，通往涅槃的修证之路。这也就是佛得道后在鹿野苑（Sarnath）“初转法轮”所宣说的“苦、集、灭、道”四谛义法理。当初净饭王派出作为王子侍从的五个人，被佛的说教深深吸引，随即出家投入佛陀门下，成为佛的最早一批弟子。从此，构成佛教的三个基本要素“佛、法、僧”三宝，意味着佛教正式形成。佛的说法布教活动，主要在中印度；他的弟子们分散到四方游化，活动范围要更大些。佛经常居住的地方，一是侨萨罗国（Kosala）首都舍卫城的祇园精舍，一是摩揭陀国（Magadha）首都王舍城的竹林精舍。80岁时，他在拘尸那伽城外一条河边的婆罗树林中涅槃（逝

① 参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四章：“印度的发现”；第五章：“世世代代的回忆”。

世)。逝世之前，他告诫弟子，切莫以为他逝世了就失去了导师，今后应以法为师，努力精进，不要放逸。相传释迦牟尼尸体火化后的“舍利”（灵骨）为八个国家的国王所抢分，被作为圣物崇拜；其中摩揭陀国安奉在菩提伽耶的一份，在公元前3世纪时，被阿育王（Aśoka）取出，分成许多份送到各地建塔供奉。后来印度一些僧人来中国时，也曾有人带来佛身舍利和佛牙、佛骨等物。

此后多少年来，无数的人怀着敬爱和虔诚，用石头、泥土、宝玉、香木等材料，把对于佛的概念塑造成了佛的仪容，以象征一种宗教精神、一种人格理想，抑或一种信仰、一种希望。

（三）

原始佛教的哲学和社会理论主要是一种奴隶主的意识形态，它的种姓平等一类思想，吸引了很大部分下层人民，但种姓平等观反对婆罗门至上主义、反对以出身决定人的社会地位思想，其实也并非佛家独创，与佛教同时代出现的印度其他一些重要思潮，如耆那教、顺世论等，也都有同样主张，其理论都具有一种辩证的精神。

但严格地讲佛陀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而是一个宗教家或道德说教者，他像希腊的苏格拉底一样，关心的是道德实践问题，而不是哲学或抽象的思辨活动。曾有一个叫结发童子的人问佛：“世有常，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tathagata）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佛陀却认为探讨这类问题徒劳无益，好比一个人受了严重的箭伤，如果不是首先去拔

出箭头进行治疗，而是急于去问箭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弓是什么形状的，羽是哪种动物毛等等，自然不对。^①因此为了解决人生的实践问题，佛在说法时按照不同对象说不同的道理。这样，加上听法者各人理解也有不同，所以佛在世时，其弟子中就产生了对各种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在佛寂灭之后的发展中，又各自发挥，渐成各种派别。

从学说思想发展角度看，印度佛教史大致可以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四个大阶段。

原始佛教是第一阶段，时间大约至释迦牟尼逝世后100年间。这一时期佛教的特点是，由于佛刚去世，他的弟子大多是亲聆过佛的教导的，所以在教义、宗教修行以及教团共同生活习惯上大多遵循佛在世时的惯例，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争论，在佛教史上被称为“和合一味”时期。

部派佛教是第二阶段，时间约为释迦牟尼去世100年后的400年间，即约为公元前4世纪到前1世纪。随着佛教流传地区日益扩大，为适应当时印度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生活、宗教和思想传统，佛教理论教义必然要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部派佛教是从原始佛教分化出来的各个教团派别的总称。最初，佛教分化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史称佛教的“根本分裂”。“部”原义为“说”，上座部是一些长老的主张，属于正统派；大众部是众多教徒僧侣的主张，比较着重于理论教义的发展。这两大派以后继续分化，形成更多流派，其中大众部又分化出8部（一说部、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制多山部、西山部、北山部），上座部又分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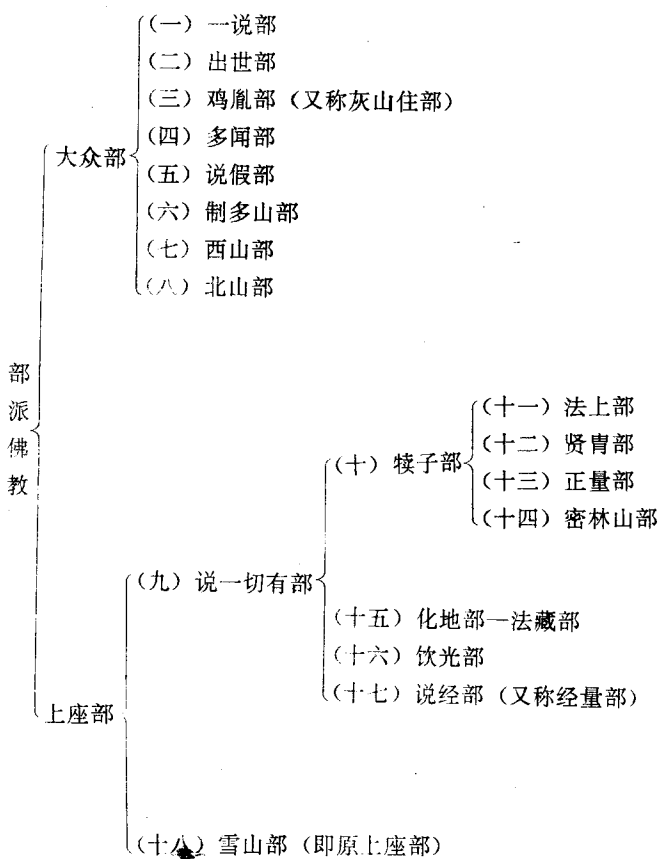
^① 见《中阿含箭喻经》。

说一切有部和雪山部，说一切有部又分化出犍子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说经部，犍子部又分化出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共 10 部，加上大众部分化出的 8 部，共为 18 部派。^① 为清楚起见，可列表如下：

无论在宗教理想、哲学理论、宗教实践各个方面，上座、大众两部都有较大分歧。如在宗教理想方面，上座部将释迦牟尼看作历史人物，主要因为其崇高的理想、正确的思想、精湛的智慧、纯洁的精神而显示出人格的伟大，一般人学法能达到的最高果位是断尽烦恼，超脱生死轮回的阿罗汉，但永不可能达到佛的境界。大众部则倾向于抬高释迦牟尼的形象和人格，将其视为超人间、超自然的“神”，而一般人学法的最终目标，也都可能达到这种非凡境界。从宗教理想和实践角度而言，大众部对后来大乘佛教的影响较为深刻；从哲学理论角度而言，则大众部的思想与以后的大乘空宗有较多渊源。

大乘佛教是第三阶段，兴起时间约公元 1 世纪。大乘佛教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中观学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派。当时印度正处于次大陆南北分立时代，奴隶占有制关系开始衰颓，在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过渡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大乘佛教即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大乘佛教思潮的产生，意味着佛教内部部派佛教之后的第二次大分化，它也意味着对于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剧烈冲击，在整个印度佛教史上，这是最大的一次分裂。大乘佛教将原始佛教贬低为小乘，但前期佛教信徒们

^① 此据世友著、玄奘译：《异部宗轮论》。



并不承认什么“小乘”之说，而自认为佛教正统。事实上，大小乘佛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实质上也的确存在明显差异，如大乘宣扬大慈大悲、普渡众生，将成佛渡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小乘则以个人的解脱为目标，并且偏重于断除烦恼、灭绝生死；而大乘追求的解脱，则将觉悟和智慧（即菩提）为目标，大乘致力于一切众生的解救，认为普渡众生的理想并不在于寂灭，而是在于永生。大乘还将从事教法活动有成就者称为菩萨，将其视为成佛（成就正觉）的前期阶段；而小乘则完全不承认菩萨。其他在对佛的看法上，在修持方法和戒律方面，在理论学说和所依典籍问题上，大小乘也有不同。但同是佛教，大小乘所遵循的佛法原则当然是一致的。

密教可以视为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密教信徒自己也将其视为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密教约开始于7世纪，至8世纪后日益与婆罗门教——印度教交融，并在在印度佛教中取得主导地位，直到13世纪初时被消灭。密教主张身、语、意三密相应，即手结契印（身密），口诵真言咒语（语密），心观想佛尊（意密），三者相应，即身成佛。由此而将其他各种以语言文字明显地表达佛教教义的教派，统称为“显教”。密教奉行咒术，重修法仪轨，教理看似简易通俗，实则不易说明，它主张立地成佛，其所谓“成佛”的境界，殊难用通常的语言界说。密教不排斥大乘佛教，但将显教看作初级阶段，而将自身看作大乘佛教发展的高级阶段。从总体上看，密教具有一种极度神秘主义的倾向。

约从10世纪末起，建于阿富汗一带的伊斯兰国家开始对印度进行渗透。此后印度佛教情势丕变。12世纪末，阿富

汗廓尔一带的穆哈马德君主，在统一阿富汗后，大举入侵印度，一直深入到恒河流域，消灭了印度的斯那王朝。13世纪，又将当时印度仅存的佛教寺院超行寺（在恒河南岸，是密教中心，寺院规模比宏伟的那烂陀寺还大）焚毁。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它标志着佛教在印度本土绝迹了。

以后又过了600年，直到19世纪末，印度才又开始掀起佛教复兴运动。

（四）

公元前273年，古代印度摩揭陀王国的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继位，成为孔雀王朝君主。他继位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使摩揭陀国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军事帝国，在印度历史上首次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在运用军事力量进行征服战争之外，阿育王还极力利用各种宗教实行教化，对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等都予以保护，尤其对佛教，更是大力扶持，加意褒扬，宣称“以法胜，是为最胜”，主张以佛教征服人心。他以大量金钱资助佛教的发展，派遣许多僧人四出弘法，把佛舍利分散到各地，并兴建了许多佛塔供奉舍利，使人瞻仰崇拜。他在政府中设置了“正法大官”执掌宗教事务，并巡回各地，宣传佛法。由于阿育王的作用，佛教开始在印度以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中亚、西域一带传播。阿育王也被后世佛教徒尊为护法大王。

印度佛教向外传播大致有北传和南传两条路线。其中北传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中亚细亚地区传入我国内地，再经中国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另一条是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形成藏传佛教，再北传蒙古、前苏联，南传尼泊尔、锡

金并回传印度北部地区。印度佛教的南传路线是传入斯里兰卡，再由斯里兰卡等地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我国云南的傣族、崩龙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

这两条外传路线中，北传佛教以大乘为主，其经典主要以印度的梵文和一些中亚民族的文字陆续翻译为汉文和藏文，因此有时又分别被称为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南传佛教以小乘上座部佛教为主，其经典用巴利文编纂，因此有时又称为巴利语系佛教。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也有两条。一条是从陆路经由中亚细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渐次深入内地；另一条是从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即通过南海传入我国内地。

自从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陆路便成为古代中国东西交通要道，商业贸易和各国使节往来十分频繁。这条陆路又有南北两条通道，北道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再经吐鲁蕃到龟兹（今库什），然后到达疏勒（今喀什）；南道由敦煌越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到莎车。印度来华僧人大都从这南北两道来中国内地，走海路的相对少些，当然这与海路的开辟比陆路要晚也有关。大约东汉时就有一些名僧经陆路，即上述南北两道，从印度和中亚细亚一些地区来中国传播佛教，如本书中的安世高即其中之一；而从海路来的名僧，据史载，至南北朝时才有。

佛教最早传入我国内地的准确年代，今已很难稽考。学界一般认为，其初传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1世纪时。因为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在印度正是大乘佛教昌盛之年，所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并不和印度佛教的发展阶段同步。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大、小乘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但是获得长足发展，并终于独树一帜，形成中国佛教的，主要是大乘。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即有一个显著特色，即和佛典译介同步进行。大约从东汉至隋唐，许多分别来自古印度（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一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一带）、安息国（今伊朗一带）、康居国（前苏联吉尔吉斯地区）、月支国（印度恒河流域、克什米尔、阿富汗一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扶南国（今柬埔寨）以及于阗国（今我国新疆和田一带）、龟兹国（今我国新疆库车一带）的僧人，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僧伽提婆、昙无讖、真谛、善无畏、不空，以及中国内地僧人法显、玄奘、义净、一行等等，都十分重视译经工作，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打下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过两个高潮，一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二是隋唐时期。

东晋南北朝（317～589年）约二、三百年时间里，南北分裂、战乱频起，社会动荡不安。南北各朝多数统治国，为维护自身统治都大力提倡佛教，劳动大众在生命难保的境遇中，也希望神佛保佑以解除苦难，佛教获得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佛典被大量翻译，中国佛界各种思想此起彼争，学术论文相继问世，不同学派如笋崛起，佛教思想终于在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抗衡中融为一体，从此走上

独立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民间信佛者剧增，独立的寺院经济逐渐形成，寺塔遍处，举世闻名的佛教石窟艺术，如敦煌、云冈、龙门等地的雕塑壁画，皆是此期营造。这一切，汇合成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隋唐时期（589～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事业空前辉煌灿烂的年代。中国佛教经过四五百年的流传后，也相偕进入宗派形成和发展的大成时期。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开始倡导佛教。炀帝更继文帝政策，使当时佛教发展十分兴隆。唐代更是中国佛教鼎盛时期，佛教理论思想和宗教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非前代可同日而语，由于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相继扶持，佛教信仰广泛深入民间，在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于是，成熟的中国佛教宗派应运而生：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创立的法相唯识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共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善导集成的净土宗；法藏创立的华严宗；慧能创立的禅宗；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一行等人奠定的密宗；号称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众流共竞，蔚为壮丽，形成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二个高潮，也汇合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波澜壮阔的浪峰。

隋唐之际创立的中国佛教各宗派，随着当时国门开放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发达，不久即传播海外，都具有世界性影响。

唐末五代以后，中国佛教总的趋势是由高峰走向下坡，由于历朝统治者对佛教时扶时抑，也由于佛教内部各宗派变化并不平衡，因此，佛教不同宗派在不同时代各有不同特点，同时各个地区盛衰情况也各不相同。